

中国文化概论

ZHONGGUO

● WENHUA GAILUN ●

刘新科/主编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 国 文 化 概 论

刘新科 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概论/刘新科著. —2 版.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 - 7 - 5602 - 9052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华文化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0421 号

☐责任编辑: 吴东范 ☐封面设计: 李冰彬

☐责任校对: 郭虹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网址: <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鼎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燃气工业园裕花路 3 号 (065600)

2015 年 4 月第 2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0 mm × 227 mm 印张: 14 字数: 270 千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	4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0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价值	16
第二章 中国古代哲学	20
第一节 中国古代哲学概述	20
第二节 儒家哲学	29
第三节 道家哲学	36
第三章 中国古代宗教	45
第一节 中国古代宗教概述	45
第二节 道 教	52
第三节 佛 教	57
第四章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	63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概述	63
第二节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特点与意义	68
第三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	73
第五章 中国古代教育	85
第一节 中国古代教育概述	85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官学	91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私学	97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书院·····	102
第五节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	106
第六章	中国古代科技·····	11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概述·····	111
第二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主要成就·····	118
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学·····	132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概述·····	132
第二节	中国古代诗歌·····	135
第三节	中国古代小说·····	141
第四节	中国古代散文·····	147
第五节	中国古代戏曲·····	152
第八章	中国古代史学·····	157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概述·····	157
第一节	史籍举要·····	164
第九章	中国古代艺术·····	173
第一节	中国古代艺术概论·····	173
第二节	中国古代音乐·····	177
第三节	中国古代舞蹈·····	181
第四节	中国古代书法·····	185
第五节	中国古代绘画·····	190
第六节	中国古代建筑·····	197
第十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204
第一节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	204
第二节	中国文化发展的新世纪瞻望·····	212
参考文献	·····	218
后 记	·····	219

第一章

绪 论



学习目标

本章扼要介绍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基本精神。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广义的文化分层面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经历的主要阶段与主要事件。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重点认识并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震惊世界的灿烂文化，它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继承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制约着我们当今的教育，为我们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大业提供历史的借镜和现实的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研究、继承、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文化概念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和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因而文化的概念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国内外有关文化的概念，据统计已有 260 余种之多。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最早是指统治者对民众的“以文教化”，与以武力征服相对应。到了汉代，“文化”成为相连的常用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用于与未经教化的“野蛮”、“质朴”相对举。

在 18、19 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文化”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它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具有制作、掘垦、居住、动植物培育等与物质生活相关的

意义,并引申出对人的性格的陶冶及品德的教养之意。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潮流中,西方的文化概念传入中国,翻译家就借我国古代的“文化”一词予以表达,然而,这种文化概念的内涵与我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已大相径庭。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化的概念作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辞海》对文化一词所下的定义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一般认为,广义的文化还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面。

所谓物质文化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物质文化常常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所谓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精神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称。包括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等。例如西安半坡村的土壤属自然物质,不是文化,但它经原始先民捏塑、烧制成陶罐之后,就成了原始文化的组成部分。这陶罐是我们祖先进行物质创造的成果,同时又是他们的精神活动产品,因为我们今天不仅可以见到这个古代生活器具实物,还可以从陶罐的彩绘图案上得到远古艺术观念的信息。所谓制度文化是适应物质文化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制度文化介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用制度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个文化中,物质文化是表层的,精神文化是最深层的,而制度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本书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采用广义文化的说法,但侧重于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两个方面。即我们在分析时不会脱离广义文化这个宽广的背景,因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精神活动是以物质活动为基础的。

关于文化的特征,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墨西哥宣言》曾指出:“可以说,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定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性的特征的完整复合性。”具体地说,文化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一是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反映不同民族个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又决定着这一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规定性,文化可以理解为每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思维和组织生活的方式。在有阶级的社

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它又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

二是文化具有地域性。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诸如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等等。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可分为长白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西北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等等，而区域的文化又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兼容性、渗透性和互补性。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又具有同一性，区域文化是民族文化整体中的若干部分。

三是文化具有继承性。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代代相传，不断延续的，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四是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每一个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词语包括了三个小概念，即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中国，在西周初期有三种含义：天子所属之城，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举；专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即夏区，用于周所封诸侯，称为诸夏，与四夷相对举。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含义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大地的统称发展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中华民族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 56 个民族。

所谓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袭着、流变着的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传统是来自于过去，而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说传统不仅拥有历史意义，而且拥有超越历史的意义。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除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外，有时又专指文学艺术，如“文化部”、“文化部门”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上创造的文化，它从远古延续到今天，已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中，从夏、商、周以来至清末鸦片战争前的这一大段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世代形成、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当代的文化。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

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动中，在西方文化的碰撞、冲击下，发生了解体和蜕变，产生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带有过渡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化。1919年“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政治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文化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中国文化的史册揭开了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泛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由于近代文化带有过渡性质，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下限放宽，也可以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不但占据了中国文明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仍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自夏商周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算起，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辉煌历史。这是汉民族文化融合、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近代以来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在这期间，中华文化从孕育形成到逐步走向成熟强大，终于以自己独特的风姿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的发展脉络：孕育期——先秦文化；奠基期——秦汉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文化；繁荣期——隋唐宋元文化；衰落与转型期——明清文化。



一、传统文化的孕育期

夏商至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在此以前，属远古文明的发端阶段，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活动等与其他民族的原始文明基本一致，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

夏商时期，阶级性与等级性取代了氏族公社时期的平等性与广泛性。生产力和自然科学虽较前有很大发展，但水平依然低下，人们承受着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迫。面对许多无法解释、难以应付的主客观世界，遂产生了命运观念、天命观念、神鬼观念。为了预知天命、预知自身的命运，古人在生活中创造和总结出各种各样的“问卜”的方法。从已发掘、整理出来的殷墟卜辞来看，其内容涉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有关天地、人生、吉凶、祸福、善恶、美丑等观念文化。其中最显著的特色是尊神、敬鬼，以先王的法令制度为不可动摇的原则，而先王的法令制度又是以上天的意志为根本。这是一种以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价值取向的原始粗陋的君权神授理论和宗教信仰。

约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灭商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一方面，周人对殷商的种族血缘统治方法加以改进，建立了兼备政治权力统治与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组织形式，这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周代统治者通过总结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民心”比“天命”更重要。虽然他们也没有摆脱天命神权的思想，但并不像殷人那样完全信赖天命，而是引进了“德”的范畴，以解释王朝兴替、人事盛衰等社会现象，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认为“敬德”与“保民”不可分割，二者结合，方能“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即实施“德治”，便可祈求天命以永保王命，开始关注人的作用，强调“民”的重要，成为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德治主义、“天人合一”思想的滥觞。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原指自然现象，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两者又因时、因地、因物而异。古代思想家以此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物质。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更把阴阳变成和“天人感应”说结合的神秘观念，更为广泛地应用在自然现象、人生过程、人生处境、身体等具体事物方面，使阴阳学说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最为根本的学说。

五行学说在殷周时代即提出，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篇，后来儒家学派的学者子思、孟轲又加以提倡。思想家们试图以五种物质元素——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战国时期流行“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相生”即相互促进；“相胜”即相互排斥。五行思想外延的应用扩展，造成了以五行为基础的多项对应系统。例如五色、五气、五时、五方、五味等系统；五脏、五体、五窍、五荣、五志之说；五行说后来又被引申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五伦”学说。

公元前 8 世纪以降，我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战乱频仍、剧烈变革的时代，出现了士人崛起、学派林立的文化景观。“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交作。”儒、墨、道、法、名、阴阳、兵、纵横、杂、农诸家出于“匡时救弊”的文化目的，纷纷著书游说，聚徒讲学，相互批驳争辩，又彼此吸收渗透。一派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盛况。

这一时期除了诸子争鸣外，其他文化领域也各有成就。在文学方面，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他的作品

《离骚》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为宏伟瑰丽、感人肺腑的长篇抒情诗，给后世许多文人以良好的艺术滋养；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优秀历史散文以及《孟子》、《庄子》等诸子的文句精粹、风致优美的散文，构成了中国散文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科学技术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天文学方面，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日月之食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也就是殷末周初，我国就建立了按时圈与赤道相截的点，划分赤道分区的完善体系。战国时期的石申和甘德分别著有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石氏星经》和《天文星占》。数学方面，殷商时即开始使用十进位法。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中已有关于分数的记载；战国时，荀子的著作里已有乘法九九表；后期墨学的《墨经》里已提到几何学的点、线、面、方、圆乃至极限和变数的概念。《墨经》更是记载了许多物理学、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医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书在公元前3世纪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总之，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时期，大致规范了后世的文化走向，后来的文化现象大多可以从先秦文化中找到其历史渊源。

二、传统文化的奠基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翦灭了六国，开始创建封建帝国的基业。统一后的秦王朝除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的措施外，在文化教育上则奉行“书同文”、“制同度”、“车同轨”、“行同伦”、“地同域”，统一语言、统一伦理和习俗等措施。这对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形成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文化传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是，秦朝统治的时间十分短暂，又缺乏统治经验，在文教政策上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如：对文化教育的作用重视不够，禁私学，又不设官学，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企图以政策法规代替文化教育；否定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和消极的烧、杀、禁来解决思想和学术上的争论和分歧，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残暴野蛮的政策，造成了文化学术的巨大损失，使六国“史记”及一部分诸子书永远地消失了。秦始皇倒行逆施的结果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秦朝的速亡。

公元前202年，刘邦起而代之，建立了汉朝，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对各项政策都作了重大调整。汉初为缓和阶级矛盾，采用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使得社会政治趋于安定，经济逐渐复苏，文化教育亦有所恢复发展。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的日益成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果断采纳并实行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把能够适应并巩固封建大一统帝国需要的儒家学说

定为一尊。当然，这个时期的儒家思想已经汉儒的改造，不再是先秦儒学的原貌，但礼教德治的精神则基本上一致。自此以后，汉代的学校教育成为经学教育。以儒学独尊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开始定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且行之久远，直至清代。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被尊崇为经，以传授儒家“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因此昌盛起来；文学艺术领域异彩纷呈，贾谊、晁错、王符等著名政论家的散文针砭时弊，笔锋犀利；司马迁、班固等卓越史学家的史传散文，秉笔直书，爱憎分明，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尤其是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记》，更以其无与伦比的史学成就被公认为“史家之绝唱”。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精美绝伦，风格奇伟，今世陕西临潼骊山秦始皇陵侧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彩绘兵马俑，令整个世界为之震动便是证明。科学技术方面，汉代出现的《九章算术》、王充的《论衡》、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都是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张衡发明了利用水力转动的天文仪器——浑天仪和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蔡伦造纸技术更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也是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传统文化的融合期

汉末至隋朝 400 年间，是一个动乱频繁的年代。诸方割据，南北对峙，打破了一元化的帝国统治，暂时瓦解了以儒学独尊为特征的文化模式，但却带来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文化上的多元发展。学术思想上，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糅合而成的玄学清谈之风成为主体，经学教育沦为形式或遭非难。而经学的衰微，解除了汉代“师法”、“家法”对人们的束缚，抛弃了繁琐僵化的考证注疏，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得以较自由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玄学的崛起，道教的创制，佛教的传播以及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颉颃，相互融合，形成了多元叠现、多元激荡的局面；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羌的纷纷南下造成了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更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学校教育方面有了新的建树，官学虽时兴时衰或名存实亡，私学和家庭教育却不曾停废，有时更加兴盛。官学也改变了单一的经学教育，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并列为“四学”。

文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学成就斐然，由“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和“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作出了大批“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五、七言诗歌。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的“永明体”，还有南北民歌作品等，更是争奇斗妍。曹丕的《典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均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篇章。

艺术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是名噪一时的著名画家；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笔端”，使人获得无穷的美感。雕塑杰作遍布各地，石窟艺术优美精致。

古代的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东晋虞喜最早发现了岁差现象，即春分点（或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逐年西移。北齐张子信发明了太阳、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 $3.1415926 < \pi < 3.1415927$ 。技术制作方面，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马钧制作了指南车等。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在多元碰撞和大融合中得到了迅猛发展，为隋唐宋元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四、传统文化的繁荣期

公元 581 年，隋文帝结束了南北分裂、战乱割据的状态，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推动了南北文化的合流。隋朝一方面尊奉儒家的礼教，另一方面又提倡外来的佛教，对道教也表示尊崇。所以尽管隋朝立国虽短，但已大体上确立了儒佛并立、兼尊道教的文化格局。

公元 618 年，唐朝建国。唐承隋制，统治集团采取了“重振儒术”、“三教并尊”的文教政策。同时尊崇儒学、佛教与道教。儒学独尊的情况略有改变，而政治体制仍来自儒家。唐代僧人依据佛教的经典，加以独创性的解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形成中国化的佛学，其中禅宗的独创性最为显著，可称为中国化的佛学。

建立在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通发达基础上的唐代文化，政策开明、气氛宽松，创造活跃，以一派恢弘气度走在世界的前列。表现在教育上，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和完备的官学体制，形成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的管理制度，增添了教育内容，扩大了专业和知识范围，在推重经学的同时，也讲求诗赋歌辞，创建了医学、算学、书学、律学、崇玄学等多样化的学校类型，为唐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注入了活力。

唐代文化的繁荣，在文学艺术方面成就十分突出。首先，诗歌创作在唐代达到了巅峰，迎来了中国诗歌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黄金时代。有唐一代，三百余年，诗体争奇斗艳，流派异彩纷呈，名家灿若星斗，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后世难以企及的“诗仙”和“诗圣”。其次，书法艺术也在唐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各体兼备，名家辈出：张旭、怀素的狂草，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的楷书，李邕的行书，李阳冰的篆书，如百花齐放，香溢千年。此外，唐代的乐舞、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也都蓬勃兴旺。

公元 960 年，宋太祖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朝因连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国势衰微，然文化发展却能秉承唐代遗风，进入更加深邃精密

的世界。

唐代韩愈排斥佛老，力图复兴儒学，但未能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到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依据先秦儒家的经典，又兼容了佛、道思想，建立了以孔孟学说为主、兼并了释、道二家的思想资料的理论体系，于是建立了理学。理学成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理学家们提出天地万物、君臣父子之间都有一个“天理”，与之对应的是饮食男女的各种“人欲”。他们主张人们应当以“天理”遏止“人欲”。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修身”和“内省”，这对强化中华民族重义轻利、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理学的思想也渗透到了宋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宋代的理学家常常以一所或几所书院作为他们讲学的场所，理学促进了学校教育，尤其是书院的发展；而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则促进了理学的兴旺发达和文化艺术的繁荣。理学的“尚理”、内省、细腻的特色也影响到宋的文学艺术，宋诗内含人生哲理，宋词则抒情委婉细密，宋代的雕塑刻画细腻，形象逼真。由于要探询万物之理，因而宋代又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峰期，指南针已运用于航海，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被制成军事武器，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在宋代有了重大发展，而且天文学、数学、医学、农艺、建筑等领域也超越了唐代，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公元1279年，元世祖灭南宋，国家重新统一，社会相对安定。与同时期尚处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相比，元代的文化发展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的开设，诸路阴阳学与社学的创立，使得民族教育、社会教育空前发展。文学艺术方面，元杂剧与散曲兴起，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等元曲大家和赵孟頫等一代书画大师。在科技方面，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的恒星表，列出的恒星多达2500颗，并和王恂一起，创制完成了中国古代登峰造极的历法——授时历，发明了测定天体方位的简仪，在历法与天文观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五、传统文化的转型期

1368年，崛起于元末群雄之间的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出于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他对于当时许多文艺才俊之士怀有戒心，因而实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国子学和地方学校的教官和学生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订有严厉苛刻的学规，对学生轻则杖罚，充军，重则杀头示众。为了强化封建专制，明朝曾四次禁毁天下书院，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破坏作用。为了尊崇和推行程朱理学，明太祖朱元璋和大臣刘基还首创了“八股取士”制度，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以八股制义为定式，

“代圣人立言”，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进一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原本繁荣活跃的文化活动渐渐沉寂下来。

时至清代，雍正、乾隆之世，步明代后尘，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屠杀知识分子，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明洪武年间的文字狱，体现了封建专制的极端残酷和野蛮。这时，中国的文化渐趋衰落了。而此时的欧洲，则经历了震古烁今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解放，科技昌盛，文化繁荣，直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可见，明清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盛极而衰，由原来的领先于世界转而落后于欧洲文化的时期。

不过，明清两代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资本主义在江南一带开始萌芽，出现了一些略带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明代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李贽批判程朱理学；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杰出学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扬经世务实思想；清代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潜心研究历史，形成著名的浙东学派。这一时期，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盛行。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学问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其共同弱点是脱离现实问题，奉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而其他学问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同时，丛书、类书的编撰，成绩显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是其典型代表。文学艺术方面，市民文学兴起，小说成为主流，创作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名著。明清也是书画艺术的一个集大成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书画之多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明代朱载堉首创十二平均律，后来被认定为世界通行的标准音调。此外，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进步与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内涵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有：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对于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作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文言》中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自然的主动精神。《象传》中则进一步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

《易经》所反映的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并以此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终生奋斗。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正是遵循了这种精神而奋斗了一生。他一生奔波，希冀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认为君子应当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儒学的后继者，对“自强”、“有为”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曾子提出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观点，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孟子从人格修养，扩充人性中善的成分这一角度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主流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民族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而言，在民族兴旺发达、昂扬向上的昌盛时期，人们把建功立业看做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海县清一，寰宇大定”、“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显示的是汉唐将士积极戍边的壮志豪情……而在民族危亡、外族入侵的时刻，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也总是激励着人民顽强不屈地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壮举。

就个人人格的独立和道德品质的体现而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或表现为大丈夫“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匡扶正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表现为在人生遭遇的挫折面前奋发图强，决不灰心，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中国历史上又有着多少辉映千秋、万古长存的《正气歌》。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易传》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礼记·大学》则盛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改革的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以民为本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民为本的精神，《尚书·夏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儒家、墨家、道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

《道德经》站在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立场上大声疾呼：“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还以愤怒之情指责杀人的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所以，“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在孟子看来，民确为立邦之本。荀子也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强化。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唐代开国君主李世民更是深谙民贵君轻之道，认定“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北宋张载宣传“民胞物与”，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这一系列重民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发展和演进，也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民为本，还表现在以儒家为主体的古代思想家重视现世的人伦生活，而将宗教和鬼神信仰置于其后。《论语》中早就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孔子说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弟子问怎样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这里，“事人”、“知死”就是关怀现实的人，关注此世的人的生命和生活。而“事鬼”“知生”就是将目光投注于人所不知的鬼神世界，孔子认为这既不可能，又无现实的必要，显示了对宗教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以后，孟子、荀子以至宋明理学家都继承了孔子“重人伦、远鬼神”的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现世人生中，强调关心国家利益、他人利益，以群体利益为先。儒家的仁学主张“仁者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墨家也主张“兼爱、非攻”，都是以爱他人，关心他人利益为重。孔子告诫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人们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在别人头上。自己立身修德了，也要让别人立身修德，自己通达事理了，也要别人通达事理，体现了一种推己及人、慈爱他人的“群体和谐”的崇高精神境界。墨子则号召人们要“共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认为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则会强不势弱，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还可以使老而无妻